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来

金岳霖 选集

JINYUELINXUANJI

胡军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岳霖选集

胡 军 /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金岳霖选集/陈来主编,金岳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06-04675-4

I.北… II.①陈… ②金… III.金岳霖(1895~1984)—哲学思想
IV.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32 号

金岳霖选集

著 者:金岳霖

编 者:胡 军

策划编辑:徐家康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校 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41.25 字 数:67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75-4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模，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雄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年12月20日

前 言

金岳霖的生平与思想

胡 军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7月14日生于湖南长沙市的一个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祖籍浙江省诸暨县。父亲金聘之是清盛宣怀尚书的部属，三品官衔，曾追随张之洞搞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母亲唐淑贤，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宦宦之家，为人贤惠善良，人称“金母唐太淑人”。金岳霖在兄弟中最小，排行第七。早年曾在长沙雅礼学校、明德学校学习。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经常跳级。传说他晚上做梦背诵四书，竟一字不差。他从小就有一种良好的逻辑意识，在十几岁时他就感觉到中国的一句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那么得出的结论便就是“朋友如粪土”。

1911年金岳霖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科，读了三年。1914年赴美留学。赴美前就专业问题征询其五哥的意见。五哥建议他学习簿计学。赴美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科。后来因为引不起兴趣，而转学政治学。他在给其五哥的信中说：“簿记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1917年获学士学位。同年暑期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学习，1918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不同国家统治者的财政权》；1920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T·H·格林的政治理论》。1920年至1921年他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教中文。1921年底赴欧洲，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听课。1922年9月至1925年底游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金岳霖常说，他对逻辑的兴趣是在“巴黎街头”产生的。那是在1924年的法国，有一天金岳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朋友在巴黎大街上散步，遇到一群人在辩论，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互不相让，他们三人也

便参加进去，争论了起来。这件事引起金岳霖的好奇，使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考虑寻找一个可靠的解决争论的方法。

1925年底，金岳霖回国，曾在中国大学教授英文和英国史等课程。1926年秋，原在清华讲授逻辑的赵元任教授调至中央研究院供职，赵向清华校方推荐金岳霖，于是清华邀请金岳霖接替赵元任开设逻辑课任讲师，不久即迁升为教授。也在这同一年，金岳霖接受了学生沈有鼎、陶燠民的建议，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1929年，冯友兰到哲学系。由于金岳霖不愿做行政工作，于是辞去系主任一职，由冯友兰接任。1931年，金岳霖赴美国休假一年，在哈佛大学向谢非教授学习逻辑学。他晚年回忆说：“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一阵。这时怀特海也在哈佛大学教书。这样，我这个本来同牛津思想关系多一些的人变成与剑桥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怀特海本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可是罗素和穆尔都是）。无论如何，我走上了比较着重分析的哲学了。”^①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转至昆明，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也随校到长沙和昆明教书和从事研究。1943年至1944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代表西南联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岳霖于1946年随学校返回北平，1949年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同年11月原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和张友渔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清华推荐金岳霖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初，金岳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春，金岳霖调至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哲学研究所，参加筹备工作的其他成员有：潘梓年、胡绳、冯定、李达、杜国庠、杨献珍、艾思奇、冯友兰、赵纪彬等。同年9月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所长潘梓年兼，金岳霖任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并任一级研究员。1956年，金岳霖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9月，金岳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介绍人为潘梓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金为中共预备党员。1978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金岳霖当选为会长。

^①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6页。

1982年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成立，金岳霖应聘为名誉校长。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终年90岁。

最初，金岳霖是专攻政治思想史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讨论和研究 Thomas Hill Green 的政治思想的。Green 不仅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论者，在19世纪的英国的哲学唯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Green 在哲学上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由于研究 Green 的政治思想，金岳霖开始接触哲学。他这样回忆道：“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 T·H·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① 从此他对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它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② 由于受 Green 的影响，他当时的哲学思想也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

1922年在英国进修期间，他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了哲学。他承认，到英国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回忆道：“到英国后，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转变。我读了休谟的书。英国人一向尊称他为头号怀疑论者。碰巧那两三个月我不住在伦敦中心，没有逛街的毛病。就这样我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想读的书，从此我进入了哲学。这是在逻辑发生兴趣之前的事情。我说‘从此进入了哲学’，是说我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的意思。显然，我找瓦拉斯的时候，我还没有摆脱政治学说思想。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③ 可见，是休谟促使金岳霖从此走上了研究哲学的道路。其时他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很大的影响。休谟 (David Hume) 和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的哲学思想对金岳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底 *Treatise* (第3页)。

①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年8月版第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行文中夹注。

②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晨报副刊》第57期，1926年6月。

③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5页。

由于罗素哲学思想的影响，金岳霖在“思想上慢慢地与 Green 分家”，即离开了新黑格尔主义思想，而从此之后“着重分析”，认为“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同上）。这是金岳霖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显然，“分析就是哲学”的哲学观是对黑格尔以来的思辨哲学的一个反动，它是分析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金岳霖用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主要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

在注重分析方面，除罗素外，英国哲学家摩尔（G. E. Moore）给金岳霖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摩尔和罗素共同开创了哲学上的“分析的时代”，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人在哲学方法的运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摩尔在早期形成其思想训练的基础是语言学，而罗素的训练却主要是数学、逻辑方面的。摩尔的思想更像是一位精细的、对日常语言有着非凡能力的语言学家的思想，而与之不同，罗素的思想则更类似于一位数学家的思想。摩尔往往求助于常识的世界观，十分着重日常语言的分析，而罗素则主要诉诸于逻辑的数学的方法，很是强调形式语言的分析。从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摩尔和罗素对他的影响。然而从行文风格和思想的细腻来说，从对概念作精深的分析上说，金岳霖似乎与摩尔更为相似，所以他素有“中国的摩尔”之雅称。金岳霖跟摩尔一样，胆跟心一样的细，每说一句话，总要再三斟酌，填满了缺陷，补足了罅缝，不留丝毫可以指摘的地方，说着一句，又缩回了半截，用了一个字，倒解释了一大套，兜着数不清的圈子，极少直截痛快地一口气讲下去。你似乎找不出一句废话来，偏偏又觉得繁琐。他们似乎不仅仅要把他们的思想内容告诉我们，并且要把理解力也灌输给我们。另外，摩尔和早期的罗素都是新实在论者，因受他们的影响，金岳霖也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为实在主义的哲学或实在主义的哲学。

当然在金岳霖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休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很多哲学问题都是直接从批判休谟哲学出发的，如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主要用来解决休谟的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的。他的知识论所论及的许多重要问题也都与休谟哲学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关系。在谈到休谟哲学对自己的影响时，金岳霖这样说道：

休谟底下 *Treatise* 给我以洋洋大观的味道，尤其是他讨论因果的那几章。起先我总觉得他了不起，以后才发现他底毛病非常之多。虽然如此，他以流畅的文字讨论许多他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表示他底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任何类似的哲学都不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表示他虽然在一种思想底工具上自奉过于俭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作一种深刻的讨论，天才之高，又使我不能不敬服。（第4页）

除受休谟、罗素、摩尔等人的影响外，金岳霖还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刘易斯（C. L. Lewis，美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我们认为，罗素的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休谟的哲学问题是形成金岳霖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仅仅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因为金岳霖本人曾经表示过，哲学分析是一种游戏。严格地运用哲学分析方法的哲学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丝不苟的技术性的训练。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与他本人所信奉的人生观或世界观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哲学的分析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信念而仅仅是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活动。这就使哲学家的个人信念和他所运用的哲学分析方法判为两概。哲学和人生也就随之失去了应有的亲密的联系。哲学分析的方法造成了哲学本身的式微。金岳霖欣赏哲学分析方法，然而他却不满意这种方法给哲学和哲学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认为，哲学家和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他为之叹息。他坚持哲学家和哲学不可分的立场。由此可知，金岳霖虽注意吸收并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但是他信奉的哲学观却是传统的，而且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他这样说道：“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① 在他看来，研究哲学的真正动机在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去理解人生，给人生以意义，过良好

① 金岳霖：《中国哲学》，写于1943年，发表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的人生。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在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理解上，金岳霖最终倒向了中国的传统哲学。

金岳霖并不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其职业，但是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第16页）。他把表达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书题名为《论道》。他答道：“道字有中国味。”这一回答似乎非常的平淡，但是它却包含有深沉的哲理，表明他在哲学上的崇高的追求。

他认为，“字不只有意义而已，它还有我们在这里叫着蕴藏的种种等等。就字说，字有蕴藏，就用字者说，也许我们要说，我们有情感上的寄托”。^①在他看来，任何文字既都有意义，也都有意味或情感上的寄托。这种情感上的寄托，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哲意的，一是诗意的，一是普遍的。对于哲学说来，最重要的是哲意方面的情感寄托，如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英国人对于 Lord、God 大都有各自相应的情感。“这里所说的是对于字的情感，不是对于字所表示的意义的情感。假如只是后一方面的感情，则换一套字或样型之后，情感不受影响。换一套字之后，意义仍旧，而所寄托的情感可不一样，这些字——现在说的不是具这些字的句子只是这些字本身——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中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隐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②金岳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情感上的寄托是一种原动力或推动力。他说：“所谓原动力或推动力，是说有这种情感的人，如果有这种情感动于中，他们总难免不有形于外的行为或动作，因而影响到生活底各方面。”^③他对字的情感寄托的分析是既透彻而又精辟的。

可见，金岳霖将其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题名为《论道》的深层原因在于他竭力要把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道内化于自己的思想与生命之中，成为自己思想与生命的内核，成为自己生命行动的原动力。

重要的不在于坐而论道，而在于身体力行地以履道、践道为己任。这是中国哲学的真精神。金岳霖一往情深地向往着这样的精神。他这样说道：“不道不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

①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11月版，第794页。

② 同上，第796页。

③ 同上，第797页。

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来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第16页）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自觉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成为了金岳霖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于道中浸润涵泳，能动心，能怡情，亦能养情。

可以看到，在金岳霖的哲学追求中，道已不仅仅是理智分析的对象，而且也是他寄托其情感的最高的真实存在。这反映出了金岳霖对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功用的独特的看法。最能充分体现金岳霖哲学思想特色的不是他的《知识论》一书，而是他的《论道》一书。他对知识论的研究采用的是典型的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态度。他自觉到，研究知识论和研究形而上学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知识论的研究追求的是客观的真，因此要严格防止私人情感的流露。他说：“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第17页）但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于哲学家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这是西方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的研究态度。

然而，形而上学的研究则应该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态度。金岳霖指出：“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同上）。哲学和哲学家不可分，哲学和伦理道德也不可分。这不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的治学态度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形而上学研究的态度上，金岳霖在有意地向中国哲学家看齐。如果说金岳霖是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自觉地愿意成为一个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应该说是很清楚的，没有疑义的。

而且，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金岳霖虽然在知识论、逻辑学的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但是他始终认为形而上学才真正代表哲学家的

哲学观或人生观。他说：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①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哲学的部分，它是从事知识论研究和逻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金岳霖对哲学作如是观，我们对他的哲学体系也可以作如是观。而且，金岳霖在晚年这样回忆道：“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②根据上述的种种理由，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说，金岳霖的哲学观或人生哲学观充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或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的哲学就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在其英文著作《道、自然和人》的最后一章《自然和人》中，金岳霖公然表明了他对中国哲学的喜爱之情。他说：“在情感上，我多少与中国哲学的风格与情怀相近，坦率地说，我喜爱我将要陈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引者注）”^③也正是在这一章中，他将人生哲学分为三类：素朴观、英雄观、圣人观。他认为，英雄观是西方人特有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西方人有着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而且在实际上也取得了令人震惊不已的成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西方人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生活在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工的环境之中。人的主体性似乎统治了一切，以至客观的自然已几乎荡然无存。然而，这种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却反过来统治、压抑着人性，人类文明因此而处在了危险的边缘。所以尽管这种人生哲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同时它也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克服的祸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岳霖不同意，甚至强烈地反对西方人特有的英雄观，而向往、追求中国传统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他称这种“天人合一”观为圣人观。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性、通透性、渗透性。因此，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截然划分的鸿沟。人的自然性就是人的本质。于此可见，金岳霖在方法论上或在工具层面上是倾向于西方思想或哲学，但在哲学观或人生哲学上却不赞同西方哲学，而自觉地继承中国哲学传统。

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借鉴，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是为了创新，正是在

① 金岳霖：《知识论》，第98页。

②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9页。

③ 《金岳霖文集》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722页。

中西哲学会通的基础上，金岳霖于30、40年代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逻辑》、《论道》和《知识论》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三部代表作。此外在1948年底之前，他还撰写了约30来篇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思想内容大致说来都集中体现在上述的三部著作中。

金岳霖把哲学划分为逻辑学、形而上学、知识论、美学、伦理学等部门。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则由三个部分，即逻辑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组成的。《逻辑》一书是他的逻辑学理论的集中的体现，《论道》代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而《知识论》则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知识理论结构。金岳霖这一哲学体系的构成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这是无疑义的，因为把哲学分成逻辑学、形而上学、知识论等几个大类本来就是西方哲学家们的看法。问题是金岳霖的这一哲学体系为何仅由这三部分而不包括他认为应该属于哲学的伦理学、美学呢？我想这样的答案应该是很简单的，这是和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专业训练等有关的。然而，金岳霖的这一哲学体系的构成模式却在客观上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在《中国哲学》一文中，金岳霖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认为在先秦尚“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然而这一关于共相与殊相的讨论却“过早地夭折了”，所以中国哲学的“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而西方则不然。他说：

欧洲人长期用惯的那些思维模式是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智特色表现为发展各种观念，把这些观念冷漠无情地搬到种种崇高伟大的事情上去，或者搬到荒诞不经的事情上去。归谬法本身就是一种理智手段。这条原理推动了逻辑的早期发展，一方面给早期的科学提供了工具，另一方面使希腊哲学得到了那种使后世思想家羡慕不已的惊人明确。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①

① 金岳霖：《中国哲学》。

根据金岳霖的这种比较哲学观，要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要促进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就必须打破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状况。金岳霖的由逻辑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构成的哲学体系在客观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逻辑》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尽、比较系统地讨论逻辑理论的著作，第一次在我国引进了数理逻辑系统，我国早期的数理逻辑学家几乎都直接地受到过此书的影响。《知识论》是迄今中国哲学界关于知识理论的第一部系统严密的著作。《论道》一书也应该说是中国哲学界中首先系统地分析和讨论共相和殊相关系问题的形而上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岳霖是打破中国哲学中逻辑，认识论意识不发达这种状况的第一人。因此，他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这三部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从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而论，《逻辑》一书在前，它发表于1935年。《论道》一书约完成于1938年，1940年发表。《知识论》完成于抗日战争期间（约在1940至1945年间）。（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那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空袭警报响了，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那一次空袭的时间较长，警报解除后，天也快黑了，金岳霖站起来就往外走，稿子遗忘在原地。等他记起来，返回去找的时候，稿子却不翼而飞了。无可奈何，只得重写。到了1948年12月12日或14日，金岳霖重写完毕，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但在当时，《知识论》已不可能出版。^①直到1983年11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从思想发展的进程而言，金岳霖认为，他是用“《论道》那样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论》那样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来写《逻辑》这本书的”。^②

《逻辑》一书主要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现代逻辑思想，其中的第四部分虽然有金岳霖自己关于逻辑学理论的种种看法，但是，显然此书还是以引进、介绍为主，不是金岳霖自己的创造。《论道》和《知识论》虽也受到了西方哲学和逻辑的影响，但却主要是金岳霖自己的理论创作。

① 见《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9页；又《知识论》“作者的话”。

② 参见金岳霖《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评》，载《逻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